

《千顷堂书目》研究

QIANQINGTANG SHUMU YANJIU

刘净净 ©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千顷堂书目》研究

刘净净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顷堂书目》研究/刘净净著. --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4
ISBN 978 - 7 - 5013 - 6450 - 3

I. ①千… II. ①刘… III. ①目录学—研究—明代 IV. ①G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7814 号

书 名 《千顷堂书目》研究
著 者 刘净净 著
责任编辑 王炳乾 耿素丽
封面设计 耕者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100034)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010 - 66114536 63802249 nlcpress@nlc.cn(邮购)

网 址 <http://www.nlcpress.com>
排 版 凡华(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装 北京鲁汇荣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印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1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3 - 6450 - 3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部(010 - 66126156)联系调换。

前 言

在我国传统目录学史上,明朝是富有个性的时代。明代私人藏书较多,且多受前代目录学、文献学思想的影响,在承继前代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和创新。相较而言,明代官府藏书不足,作为中央主要藏书机构的文渊阁藏书散佚过快,终明一代没有一部像样的官修书目。而自汉代始,《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史志书目多是以官府藏书目录为基础而编纂的。明代政府藏书的不足以及对藏书整理的忽视,使得明代史志目录的编纂无所凭借,明代艺文志的编纂也较为曲折。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明王朝修《国史》,焦竑分纂艺文部分,编成《国史经籍志》。《国史经籍志》虽为明王朝所修,但是著录本朝的著作仅是极少一部分,所录宋、辽、金、元、明人著作不及全书三分之一;且抄录诸家书目而成,未能据目考书,错误纰漏较多。清顺治五年(1648),清王朝开始撰修《明史》,最初由傅维鳞承担艺文志的编修工作。傅氏仍采用纪藏书之盛的方法,力求记录明一代之藏书,但是其在具体实施中又仅据《文渊阁书目》一种,《文渊阁书目》所录几乎全是明以前书,少有明人之作,故所成《明史·艺文志》同焦氏《国史经籍志》一样,反映不了明代著作情况,因此未被采用。此后,尤侗也承担过《明史·艺文志》的编撰,但亦未有大的改观。康熙二十年(1681),黄虞稷由徐乾学荐举入明史馆,分修艺文志,改变传统纪藏书

之盛的体例,采用纪一代著述的方式,广泛参阅公私藏书目录,搜罗明代著述,成《明史艺文志稿》,后又经王鸿绪、张廷玉之手,几经删削,遂成《明史·艺文志》。黄虞稷和《千顷堂书目》也因与《明史·艺文志》的渊源,而为历代学者所关注。

《千顷堂书目》在承继前代目录学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突破,具有鲜明的个性与特色:虽以私家藏书为基础,又不局限于此,而是采用记明一代著作的方式,开目录学史上断代书目之先河。既体现了明代社会的特性与变化,又可以折射出历史与时代的发展。

《千顷堂书目》为黄虞稷在其父所撰《千顷斋藏书目录》6卷的基础上,广收博采,以个人之力、穷数年之功编撰而成。全书总计32卷,分经、史、子、集四部51类,每类下先列明人著作,后附南宋咸淳以来和辽、金、元各朝著作,收录明人著作15000余种,附载宋、辽、金、元著作2400余种。而王鸿绪删订后的《明史·艺文志》仅著录4600余种。从数量上来说,《千顷堂书目》是其三倍还多,是迄今收录明人著述最多的书目。此外,《千顷堂书目》著录“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①,内容涉及作者字号、里籍、科名、官爵、生平经历,偶述成书年代、内容要旨等。这些不仅是考察明代人物生平,也是考察历史、地理、职官等史实的重要文献。它著录了明洪武元年(1368)至崇祯十七年(1644)间的重要人物和著作,以及宋、辽、金、元四朝的重要著述,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农学、医学等诸多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千顷堂书目》在承继前代目录学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突破。该书目摒弃一代藏书之盛的传统做法,采用断代著录的方式,于中国目录学史开创记一代著述的断代书目。这既符合历史的断限,同

① (唐)魏徵等:《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907页。

时于目录编纂事业、目录学发展而言,则在以往历代书目的基础上补充了明代最新的文献,从而在能力范围内有效地保证了书目著录文献的连贯而不重复。《千顷堂书目》记明代著述之外,又兼补宋、辽、金、元之书,开创补正史艺文志之先河。《千顷堂书目》还远绍南朝齐王俭《七志》的传录体形式来增补书目记载的内容,也是此书目的重要特色之一。整部《千顷堂书目》小注的重点并非书籍内容、学术渊源,而侧重于立传,即对书籍作者的介绍。长期以来学界的普遍观点是,传录体目录肇始于王俭《七志》,魏晋南北朝后几无发展。王重民、姚名达等所作目录学著作虽对此特点略有提及,但均未将其视为传录体例。笔者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千顷堂书目》中作者小传进行统计、分析,将传录体之延续使用考订至明代。

此外,虽然《千顷堂书目》是内容、体例均具有鲜明特色的明代代表性书目之一,但是至今在成书、性质、作者等基本性问题上尚存诸多争议,有待进一步探讨。尤其是近年来某些学者甚至于将《千顷堂书目》界定为史志目录,还有学者试图由《千顷堂书目》分析黄虞稷藏书特色等。此类研究及成果的出现,究其原因多是对该书目性质、成书认识出现偏差所致。只有廓清和准确认识这些基本问题,才不至于使研究工作偏离方向,从而更好地使用该书目。

本书将《千顷堂书目》置于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国目录学史的多维视角下,通过对《千顷堂书目》收入图书的范围与途径、著录图书的内容与数量、著录体例等方面的详细分析,客观、准确地论述《千顷堂书目》的性质、体例以及与《明史·艺文志》关系等较有争议的问题。由此入手,通过比勘明代其他书目,尤其知见性书目,同时参考明代的地方志、登科录及其他史料,对《千顷堂书目》著录的图书、作者小传等内容进行考订,以求考订史料之真实准确,并以此为基础对

《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的关系进行考订。从而在辩证肯定《千顷堂书目》价值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千顷堂书目》的目录学价值、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千顷堂书目》成书背景	(1)
第一节 时代背景	(1)
第二节 明代出版概况	(8)
第三节 明代藏书文化	(20)
第四节 明代书目文化	(33)
第二章 千顷堂藏书与《千顷堂书目》	(42)
第一节 黄氏父子生平	(42)
第二节 千顷堂藏书	(48)
第三节 千顷堂藏书与《千顷堂书目》之关系	(52)
第三章 《千顷堂书目》的性质	(59)
第一节 《千顷堂书目》性质之争议	(59)
第二节 《千顷堂书目》性质新论	(70)
第四章 《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稿》	(79)
第一节 前人研究之梳理	(82)
第二节 基于史料之《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稿》 关系辨析	(89)
第三节 基于书目内容之《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稿》 关系辨析	(92)

第五章 《千顷堂书目》的体例和分类	(128)
第一节 传录体例考	(128)
第二节 《千顷堂书目》的传录体例	(148)
第三节 《千顷堂书目》的分类	(157)
第六章 《千顷堂书目》的影响及价值	(165)
第一节 《千顷堂书目》的影响	(166)
第二节 《千顷堂书目》的价值	(176)
结 语	(187)
附 录	(191)
附录1 《千顷堂书目》之版本	(191)
附录2 《徐氏家藏书目》所录《千顷堂书目》未著录明人 著作	(198)
附录3 《百川书志》所录《千顷堂书目》未著录明人著作	(239)
主要参考文献	(253)

第一章 《千顷堂书目》成书背景

第一节 时代背景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经过南征北战,战胜元末群雄,于1368年建立明王朝。1644年,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明王朝宣告结束。276年间,明王朝共经历了十七朝十六帝^①。与此前历代大一统王朝相比,明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展现出了独有的特色。这些特色或刺激或制约着明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使得明代的图书出版事业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面貌。

一、明代政治经济状况

1. 明代政治状况

与前代一样,明朝政治上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主要表现为皇权与相权、皇族内部、皇权与宦权的矛盾,对外主要表现为与北方少数民族以及东南倭寇的关系方面的矛盾。

朱元璋充分吸取元代灭亡的教训,在其自称吴王之际,便招揽天下名臣硕儒,以备参咨国用。但是朱元璋出身卑微,对皇权又格外的迷恋,使得他对位列朝班的文臣武将忧心忡忡。他总结元代灭亡的原

^① 明朝灭亡后,残存于南京、两广等地的明朝残余势力不计在内。

因是“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①。他通过对朝臣一次次的兴狱打击,终于在洪武十三年(1380)借“胡惟庸案”废除丞相及中书省,实现了君权的高度集中。然而,朱元璋的后继者们虽迷恋权位,但凭一己之力已难以应付纷至沓来的奏疏。这一点早在朱元璋时期就已初显端倪^②,成为设置四辅官及殿阁大学士的初衷之一。至明成祖时,永乐皇帝又选择一批亲信大臣入职文渊阁,参与机务,奠定了明代内阁制度的基础。明代的内阁经过仁宗、宣宗时代的发展,至世宗嘉靖及神宗万历时达到全盛。在内阁发展前期,内阁大臣还操持文柄,《山志》载:“旧例,翰林官丁忧,其墓文率请之内阁诸公。”^③这一职责的存在,使得内阁官员为捍卫自我权力而主动请缨负责皇宫内文化典籍的收藏与整理工作。

与对文臣武将的猜忌相反,朱元璋对其子嗣采取了分藩制度,曰:“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④并相继颁布了《祖训录》和《皇明祖训》,用以约束、规范诸王行为。于是从东北到西北辽阔的北方边防线上布满了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等藩王。这成为明王朝同中国历史上汉朝以外其他大一统王朝的最大区别。到成祖朱棣采取“削藩”政策,宣德以后朝廷对藩王的限制越来越多,藩王的权力日益缩小。延至明末,他们俨然已成为社会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九,上海书店影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82年。

② 张显清、林金树所著《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曾对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奏札做过统计,朱元璋平均每天需审批的公文为207份,处理的事务多达411件。

③ (清)王弘:《山志》卷一,中华书局,1999年,第15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五一。

的寄食之虫。多数藩王或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或出于自身爱好,都积极参与书籍刊刻及文学创作之中。藩府刻书的繁盛成为明代刻书史上最为突出的特点。

明代宦官专权尤盛。黄宗羲云:“阉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①有明一代,权势熏天的宦官很多,正统时有王振,成化时有汪直,正德时有刘瑾,天启时有魏忠贤。在宦官权力逐渐扩张的同时,司礼监的地位也迅速崛起。至幼主英宗即位,太监王振已然掌握了朝中大权,司礼监也逐渐将各衙门的权力集于一身,成为内府二十四衙门中的第一监。与此同时,司礼监还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图书的刊刻印刷,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经厂。经厂刻书盛极一时,成为明代刻书的另一个特点。

2. 明代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方面,明初朱元璋秉持“先王之教”,采用传统的重农抑商之策。他说:“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途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衣,欲人无贫得乎?肤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庶几可以绝其弊也。”^②本此原则,朱元璋颁布了种种措施。如“黄册里甲制度”,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③。对待商人则层层征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④。

① (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阉宦上》,《海山仙馆丛书》本。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五。

③ (明)朱元璋:《大诰续编》之《互知丁业第三》,明洪武内府刻本。

④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中华书局,1974年。

并限制其地位,将其排除在国家编户齐民之外。规定“今后诸处有司衙门皂隶、吏员、狱卒,不许用市井之民”^①。此种休养生息、重农抑商的政策一直沿续至明代中期。

明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物资需求的增长以及交流活动的频繁,商品经济越来越活跃,一度达于繁盛之势。官府对待商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质的改变。商人不再是国家编户齐民之外的最底层,反而可以通过捐纳获得一定的官职。例如景泰元年(1450)便有捐纳获荣的命令:“命舍人军民有输米豆二百五十石,或谷草二千束,或秋青草三千束,或鞍马十匹于大同宣府助官者,悉赐冠带以荣其身。”^②当权者对商人阶层亦开始有所认同,并充分考虑他们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张居正就说:“商通有无,农力本穡。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穡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③与此同时,随着商人阶层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也常常延请文人名士为其撰写墓志铭等应用文章。不论文士是否出于利益之考虑,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明代文人的文集付诸刻印时是大量留存这些文章的,这也体现了他们对商人已不再是明初刘基所谓“家家种田耻商贩”的态度了。并且有的商人还被文士称为“诗贾”“儒商”。此外,随着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实行,规定“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④,这就使得明初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政策失效,客观上促进了农民摆脱土

① 《大诰续编》之《市民不许为吏卒第七十五》。

② (明)叶盛:《西垣奏草》卷四,明崇祯赐书楼刻本。

③ (明)张居正:《赠水部周汉浦樵浚还朝序》,《张太岳先生文集》卷八,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

④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地的束缚,走上经商之路。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孕育和刺激了资本主义萌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二、文化学术背景

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另一种表现方式。随着明代封建集权专制的实行,其文化政策也呈现出高压态势。但这并非意味着明代文化领域的黯淡无光。恰恰相反,在这种高压的背后却孕育着前所未有的曙光,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相对松动,以及思想界阳明心学的兴起等因素,刺激着晚明文化的繁荣。

首先,朱元璋为巩固皇权,与在朝堂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做法不同,在朝堂之外软硬兼施。他一方面昭告天下,访求贤才,如洪武元年颁布《求贤诏》:“然怀才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有司之失于敦劝欤?朝廷之疏于礼待欤?抑联寡德不足以致贤欤?……今天下甫定,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联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者,有司礼遣之,朕将擢用焉。”^①另一方面大开杀戒,尤其是对心怀芥蒂的张士诚统领下的吴中文人。朱元璋不仅钳制读书人的思想,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来杜绝读书人参与政事,《学规》就规定:“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当该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当,惟生员不许。”^②

其次,明政府还通过教育等形式,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化。明初朱元璋鉴于由元入明的知识分子不愿出仕的状况,一方面大开杀戒,另一方面则开展一系列的教育举措,培植新的人才。尊孔依然是

① 钱伯城等:《全明文》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4页。

②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七八《学规》,明万历内府刻本。

明王朝统治者最主要的做法,且历朝都有提升孔子地位之举,至嘉靖时,孔子的地位已由宋朝时的“至圣文宣王”上升到“至圣先师之神”。孔子的地位如此,其弟子曾参与编订的四书五经及程朱注疏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举子的教科书。明太祖规定:“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①然而,朱元璋因出身,对经典中的文字比较敏感,尤其是对《孟子》中的言论大为不满,于是对《孟子》的文字内容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到朱棣上台,令胡广等人修《五经四书大全》。至永乐十三年(1415)九月,胡广奉命修完《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二书乃成为品评士子的唯一标准,最终将知识分子束缚于程朱之学的框架内。何良俊感慨说:“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夫汉儒去圣人未远,学有专经,其传授岂无所据。况圣人之言广大渊微,岂后世之人单辞片语之所能尽。故不若但训诂其辞而由人体认,如佛家所谓悟入。盖体认之功深,则其得之于心也固;得之于心固,则其施之于用也必不苟。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衍,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②

再次,明政府还加强文化的管理干预,严禁一切不利于统治及有关君王的言论。明王朝明确规定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先圣先贤的形像。对于小说家言,历代统治者都讳莫如深。正统七年(1442)李时勉奏请禁《剪灯新话》系列小说时,道出了其中缘由:“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

①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论》。

②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22页。

恐邪说异端日新月异，惑乱人心，实非细故。”鉴于此，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签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①。故《金瓶梅》之属，甚至《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均在禁毁之列。随着心学的兴起，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其对程朱之学的冲击。嘉靖八年（1529），即王阳明去世的第二年，嘉靖帝不仅削夺其爵位，而且批评他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招致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②将士风的败落全归罪于王阳明。十年后，嘉靖帝直接下令：“今后若有创为异说，诡道背理，非毁朱子者，许科道官指名劾奏。”^③晚明思想家李贽，不仅所著书籍遭到禁毁，其本人也以异端的身份丧命狱中。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的活跃及统治者疏于政事，自明代中期起，统治者的禁令与现实成效已经大有背离，甚至有些皇帝作为读者也津津乐道于时下流行的书籍。明武宗要侍从急购《金统残唐》一书便是很好的例证。何况，统治者颁发的禁令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剪灯新话》是洪武年间问世并刊刻流传的小说，然而直到正统时方才被禁，这距书籍初刻年代已有数十年。此外，万历三十年（1603），朝廷下令禁以小说语入奏，其隐含的事实便是士大夫已习惯于将小说言辞用于奏章。当一种行为衍化为风气时方出令禁止，其效果可想而知。许多文人士大夫已经参与小说的创作与评点之中，更有甚者将小说置于与词曲同等的位置，从文学的角度予以关注。如袁宏道在给董其昌的信中就直言：“《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

① 《日知录之余》卷四，清宣统二年吴中刻本。

② 《明史》卷二七三《列传》一二四。

③ 《皇明诏令》卷二一《今圣上皇帝》，明刻本。

枚生《七发》多矣。”^①可见,明代的小说、戏曲等俗文学,虽在明代高压政策下受到一定的制约,但仍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普及。明代文集的创作也空前繁盛,这一点从《千顷堂书目·集部》的著录可略见一斑。

第二节 明代出版概况

中国典籍,浩若烟海。或书之竹简,或载于缣帛,或印于纸张。其中唐末镂版之术可谓书籍史上一大关捩。后历经五代、辽、宋、金、元之发展,迨至有明,随着社会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思想变革及社会风气的影响,其出版事业,可谓异彩纷呈,呈现出前代未有之特点。

一、出版业总体状况

明代雕版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刻书业的繁盛,许多文献得以大批量印刷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和鼓励了文人学者的创作激情和学术氛围。明代典籍的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就刻书数量的时代分布而言,生活于正统至弘治年间的陆容概述明代前中期的出版状况:“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盛,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②由此可大体推知,从洪武至正统这一百多年间,明朝的出版业尚显萧条。日本学者

①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二一,明崇祯刻本。

②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〇,中华书局,1985年,第128-129页。